

中国过程研究

China Process Research

第四辑

赵 成 姜德刚 王治河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过程研究

China Process Research

第四辑

赵 成 姜德刚 王治河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过程研究. 第四辑 / 赵成, 姜德刚, 王治河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161-8211-6

I. ①中… II. ①赵…②姜…③王… III. ①过程哲学—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951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16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过程研究》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叶秀山	朱德生	陈村富	黄长著
主 编	赵 成	姜德刚	王治河	
执行主编	曲跃厚	霍桂桓	樊美筠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立群	万俊人	王立志	王成兵
	王志成	王治河	王南湜	邓晓芒
	冯 平	乔瑞金	任 平	刘孝廷
	刘全华	成长春	曲跃厚	朱志芳
	朱葆伟	朱德生	衣俊卿	张一兵
	张再林	张志伟	张志林	张学广
	张桂权	李 河	杨 丽	杨 明
	杨 深	杨富斌	陈村富	庞学铨
	李小娟	李 方	赵敦华	赵鹤龄
	罗嘉昌	金吾伦	金惠敏	周邦宪
	孟根龙	欧阳康	俞宣孟	俞懿娴
	郭少棠	姚大志	倪培民	袁祖社
	唐凯麟	黄 勇	黄长著	黄书进
	黄 铭	高峰强	陶秀璈	傅有德
	曾庆华	温恒福	谢文郁	靳希平
	裴 勇	赖品超	蔡 仲	樊美筠
	黎红雷	霍桂桓	鞠实儿	

目 录

过程思想与生态文明

- 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与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 赵 成 (3)
- 生态文明呼唤超越“学科崇拜”
- 基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王治河 樊美筠 高淮微 (19)
- 面向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 兼论建设性后现代的逻辑进程 史 巍 韩秋红 (35)
- 消费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 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看 陈勇军 (44)
- 全球视野下的生态文明“榕树理论”与“潘多树理论”
- 基于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模型 张修玉 (54)

过程思想与教育问题

- 怀特海与后现代教育 俞懿娴 (59)
- 怀特海的认识论及其对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启示 ... 杨 丽 温恒福 (79)
- 建设性后现代教育思维简论 温恒福 (93)
-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应克服的几种倾向
- 从过程哲学的视角看 曲跃厚 (104)
- 怀特海教育节奏学说的模式化研究 卢建筠 (113)
- 建设性后现代视域下的青少年堕胎问题研究 董玉卓 王治河 (120)

过程哲学的原理

- 论怀特海的哲学观 杨富斌 (137)

怀特海的“摄入”概念	王立志 (150)
怀特海的价值论	陈伟功 (161)
怀特海有机美学初探	樊美筠 (171)

过程哲学与中国

东圣西圣、心同理同

——兼谈熊十力、怀特海及中西文化融摄会通的

新契机	郭海鹏 (191)
儒家的“生生”与柯布“大写的生命”之比较研究	柯进华 (207)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	吴伟赋 (222)

海外来稿与访谈

伦理学与宇宙的结构	[美] 大卫·R. 格里芬 (235)
过程哲学与系统管理	[美] 菲利普·克莱顿 (244)
中国与西方过程思维中的内在超越性	[荷兰] 扬·恩伯茨 (254)
如何做一名后现代家长	[美] 杰伊·迈克丹尼尔 (262)
寻求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新途径	
——访美国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柯布博士	柯布/杨富斌 (268)
走出现代性的雾霾	
——对话美国过程哲学家斯蒂芬·劳尔教授	劳尔/樊美筠 (284)

过程哲学书评

《怀特海与中国哲学的第一次握手》序	[美] 小约翰·B. 柯布 (295)
现代化困境的破局之匙	
——评王治河、樊美筠博士的《第二次启蒙》	闫 艳 (297)
《科学与哲学论文集》校后记	曲跃厚 (301)

过程思想与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与 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

赵 成

随着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以及对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威胁，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出现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固有缺陷，使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成果的结果。为解决危机、消除工业文明的固有缺陷，人们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建设要求，以期消除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指出一条正确的文明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战略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等的战略地位，从而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善战略体系，这不仅体现着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位的新认识，也体现着中国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决心。特别是，生态危机作为工业化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消极环境成果，其最终解决必然有赖于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实现其生态化转向，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为此，了解“五位一体”发展战略的意义，从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探讨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要求和实践基础，对于深入理解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式的理论内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五位一体’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研究”（14AKS012）和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L12DKS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生态环境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保护思想到9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再到21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都体现着其思想认识的不断升华。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首次明确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发展战略,科学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关系,大大提升了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及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重要意义的认识,由此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不仅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且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即“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明确地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和发展战略中,从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并且,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及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所确立的五个方面的目标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确立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3]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科学定位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十七大以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思想的不断丰富。

特别是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

内容之一，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不仅重申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而且首次说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关系，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布局与实践指明了方向。这就是：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就必须从国家总体发展的高度，对我国的资源、环境空间进行科学的规划、保护和合理利用；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对传统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彻底改造，以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并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得以形成；这又需要不断完善和加强包括法律法规和社会管理制度在内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生态文化建设，以便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和文化支撑；只有这样，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真正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才能实现建设美丽中国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美好目标。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4]、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实践途径。可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其实质体现着对传统工业文明发展道路的否定和改造，是对生态文明这种新的文明发展道路追求。其意义就在于：

首先，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发展战略中，不仅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本质、特征及其建设途径科学认识的必然结果。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出，是对中国未来几年整体发展的一种基本要求，这种整体发展不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也包括以可持续发展为特征、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生态文明的发展；否则，即使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取得了多么重大的发展，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若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和根本改善，也不能说我们就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更何况中国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也充分证明，若不有效地控制和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不仅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而且中国的经济也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保护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来看，尽管也在不断

强调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但我国资源环境问题恶化的趋势却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虽然中国生态环境问题表象于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但从它产生的原因和本质特征来看,则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发展并未摆脱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和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密切相关。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生态环境问题是影响环境质量的核心问题,因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就成为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的必由之路。特别是人们对环境的利益需求,已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生活的利益要求越来越具有同等重要的情况下,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建设美丽中国就成为我国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而生态文明的发展要求和特征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必然产生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环境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生活的成果,这些成果也必然会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提出新的要求并渗透于这些建设的全过程,从而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改造,促使其发生生态化的转向。因而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等的战略地位,不仅符合生态文明的发展要求和基本特征,而且还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

其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战略中的突出地位并要求将它“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说明了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有赖于对资源环境本身的规划、保护和治理,更需要来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撑,否则,其建设目标即“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愿望就难以实现。为此,就需要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上,进一步确立生态文明建设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要求和目标体系,从而为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提供有效的实践途径。

生态文明的研究表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本质上体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和矛盾,它是由人对待自然的错误态度和行为造成的,即表现为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浪费以及对生

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这种行为结果不仅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也威胁着人类自身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是一种偏离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和目标的不可持续之路,也是对待人类的生命母体(地球自然)的不文明之路。因而,资源环境问题并非是一种单一性问题,而是一种渗透性的综合性问题,即并非局限于生态环境领域,而是以生态环境领域为外在表象,以经济发展模式、政治法律管理、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方式为根源,广泛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综合性问题。因而其解决途径,不仅需要进行“末端治理”即针对已有或阻止环境污染、破坏等所采取的经济的、技术的、法律的、行政的、宣传教育的等一系列治理活动,而且更需要将这种“末端治理”最终转化为“源头治理”即从整个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生活基础上对原有“基础”进行改造,以培育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要求的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生活方式,从社会发展的内在基础和源头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5]然而,要真正实现“源头治理”,就需要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时,以生态文明的发展要求去制定相应的经济的、政治法律管理的、文化的和社会生活行为的目标体系,以指导各个领域的发展,并使其具有实践操作性。否则,就不可能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以实现其发展目标。

再次,强调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6]的建设理念以及对建设生态文明现实途径和核心问题的科学把握,这必将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从中国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状况来看,始终存在着保护与建设实践落后于国家政治要求、战略要求以及政策要求的情况,其原因之一就是还没有建立起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使国家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各项理念、方针政策以及战

略规划通过其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得到贯彻执行,因而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由政治理念、战略规划走向社会实践的基本途径和关键。为此,就需要依据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在现有制度体系的基础上,不仅从国家和省域两个基本层面上,对现行环保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构建以环保制度(如政府监管、市场交易和责任追究损害赔偿等)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而且还应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去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制度体系,即培育与生态文明发展相适应的生态政治制度、生态经济制度、生态文化制度和生态社会制度,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来凸显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为实现其融入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以及“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目标提供制度保障。也就是说,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道路的基础上,对原有的、以工业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进行改造。

最后,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总体战略,也必将对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全球瞩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全球资源环境的影响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发展需求,以及位居全球第二的经济总量,中国经济已经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对全球资源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甚至成为某些西方国家恶意诟病中国的依据。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对全球资源的合理、公平地利用和保护,是每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中国的生态环境作为全球生态环境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好坏,不仅关系着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关系着整个人类的福祉。为此,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是解决中国自身环境问题、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问题,也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改善全球生态环境和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所应尽的责任。如此从国家、政府层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这在世界各国也是独一无二的,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面向世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因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也必将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和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总之,从“五位一体”发展战略的高度,把握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间的内在有机关系，在改造工业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生态化建设，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并最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

二 生态化生产方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自然、社会与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实践方式特别是生产实践方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它决定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也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因而，生产方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就是说，一种新的文明形式的产生和发展有赖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形态可以看出，在文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出现总是表现为一种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它决定了这种新文明形态的基本特征。如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农业文明的基本特征，工业化生产方式决定了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新的生产方式并不是要彻底消灭原有的、旧的生产方式，而是在对旧的生产方式改造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它既包含有旧的生产方式，又包含有新的内容，如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既是在近代科学技术和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机械化大生产方式，又包含着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机械化、技术化的改造。而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作为应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恶果的有效解决途径，体现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共生、共赢的和谐发展之路，本质上是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其产生和发展同样有赖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而这种生产方式应该是在克服工业化生产方式缺陷并对它改造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与工业化生产方式既有联系又有质的区别。

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要彻底消灭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而是要通过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改造，克服其在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弊端，形成一种既与工业化生产方式相联系又与其相区别的新型生产方式。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就其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联系来说，依然是一种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方式。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已被证明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迄今为止最有效的一种生产方式，很难想象还有不依靠科学技术的进

步和不采用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更为有效的生产方式。那种试图完全否定或抛弃工业化生产方式而“重返自然”、回归“原始生活”或“自然生活”的观点，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因为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看，工业文明毕竟是一种高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的文明形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体现着人类生存与发展能力的不断提升，也是由社会内在矛盾和规律所决定的必然趋势。因此，作为生态文明物质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能完全摆脱工业化生产方式，而只能是在已有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去改造不适应人类持久生存和发展的内容，并赋予其新的内容，以满足生态文明的发展要求。

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所要求的生产方式与工业化生产方式在很多方面又有着质的区别，这些区别也表明了这种生产方式是一种更能促进自然、社会与人持续、健康、和谐发展的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从文明发展的意义上来说，工业化生产是一种只顾人类自身而不顾自然的生产方式，表现为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佐证。而生态文明建设所要求的生产方式应该是一种既顾及人类自身又顾及自然的生产方式，因而是一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

工业化生产方式虽然是至今人类生存与发展中最为有效、先进的一种生产方式，但由于其生产的目的和价值指向，仅仅是为了满足人及其社会的物质需要，这就使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只是关注如何尽最大的可能和最便捷的途径从自然中获取人及其社会所需要的自然资源，而不关注自然本身的发展状况，从而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使地球自然仅仅成为人们可以随意获取物质利益和倾泻废物的“原料库”和“垃圾场”。而生态文明建设所要求的生产目的和价值指向则不同。其生产的目的是价值指向，不仅是为了满足人及其社会的物质需要，而且还要考虑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实际承载能力。也就是说，生态文明要求社会对物质财富的积累是以不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为限度，而不是对物质财富的无限积累。社会生产活动不仅以获取社会所需的物质财富为目的，而且也以获取良好的生态环境成果为目的，从而确保生态环境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整个社会生产都是以尊重生态环境的规律为前提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不是以追求物质生产和消费的数量为前提，而是以质量为前提。倡导适度生产和适度

消费，社会更注重的是精神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发展。由此，就使这种生产方式成为一种更为有效、持久的生产方式。

三 生态文明建设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变革要求及其特征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在变革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工业化生产方式相比，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对生产活动、科技、产品、消费以及生产关系等都具有不同的要求和特征。

首先，对生产活动的基本要求不同。由于工业化生产主要是一种商品生产活动，其组织形式主要是企业或公司，而生产活动对人及其社会物质需求的满足，在当代社会又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和市场调节来实现的，这就要求每一个生产企业或公司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通过商品生产与交换来实现其对经济利润的追求，否则，它就无法生存。为此，生产企业就必须最大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以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至于减少成本的代价是否是以自然为代价，则主要取决于它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压力的强弱。只要生产企业对环境污染排放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小于其利用和污染处理的成本，就不可避免地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除非这种污染成本已经等于或高于它处理污染的成本，或者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进行污染处理。同时，尽管企业在组织生产时，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有计划的生产，但这种计划并不能把生态环境的可承载能力和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考虑在内，只要能以最便捷、廉价的手段获得低成本的优质生产原料，就不会考虑对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节约，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也就不可避免；除非这种浪费成本已经等于或高于节约资源的成本，或者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浪费。更何况市场本身是无计划的，受到所谓“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和供求关系、价值规律的调节，整个社会产生呈现出一种盲目、无序的状态，特别是相对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来说，更是如此。这就从客观上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污染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使社会经济活动具有了污染和浪费的特征。为此，生态文明建设就要求改变这种状态。